

概念、机制与议题：萨拉菲主义研究的本土化*

宁 彧 王 涛**

内容提要 萨拉菲主义是国内学界持续关注的重大宗教、政治、安全问题。在对西方学界成果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实现了对萨拉菲主义宗教文化内涵的拓展与政治安全议题的回归。“历史说”与“现代说”、“组织形态”与“观念形态”、“纯洁派”与“政治派”及“圣战派”的重叠身份等的争论在西方学界早已有之，而国内学界则在“历史说”的基础上，基于观念形态与组织形态的双重认识，分析、梳理了萨拉菲主义在体系、单元层面的扩展与渗透，继而区分了由于载体与实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萨拉菲主义演变机制，在注重时代特征的同时，避免了重陷西方“条块化”“标签化”的认知困境。此外，由于对萨拉菲主义宗教文化内涵的有益扩展，国内学界在政治安全领域形成了不同观点的交锋。其中，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功能、萨拉菲主义与敏感地区的安全局势，既有经验层面的分析，亦有理论层面的思考，同样回避了对萨拉菲主义“过度安全化”的误区。

关键词 萨拉菲主义 意识形态 地区安全

自 2011 年以来，一些极端组织在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持续扩张，以至于形成了具有网络性，乃至体系性的存在形式。崇尚尊古、重训的萨拉菲主义（Salafism）成为一些极端组织的旗帜性理念。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我国对非洲安全合作升级版的对策研究”（19CGJ028）的阶段性成果。

** 宁彧，博士，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王涛，博士，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当前,西方学界就萨拉菲主义的本体论、实践论、影响力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架构。^①不过,由于整体研究视角深陷“安全化”的思维束缚,导致萨拉菲主义在西方的研究视阈下更倾向于其“政治安全”影响,忽视了萨拉菲主义所具有的宗教文化内涵。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类型化”“条块化”“标签化”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萨拉菲主义的“狭义”认识。与之相对,国内学者对萨拉菲主义同样保持高度敏感性,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成果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广义上的本土化解释路径,此项工作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秉承萨拉菲主义研究的历史路径,阐释萨拉菲主义的宗教文化内涵;二是突出萨拉菲主义研究的政治路径,言明萨拉菲主义的演变动力;三是突出萨拉菲主义研究的安全路径,分析萨拉菲主义之于恐怖主义、地缘政治的关联。另外,在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阈下,诸如伊斯兰主义、瓦哈比主义、赛莱菲耶,乃至伊斯兰极端主义(部分思想)等包含了萨拉菲主义相关内容,因此,在进行必要的区分后,上述概念被视为萨拉菲主义的相关研究而论述之。

一 概念:萨拉菲主义宗教文化内涵的辨析

萨拉菲主义是伊斯兰世界尊古、重训,倡导回归传统伊斯兰的代表。在此语境下,国内学界对萨拉菲主义的使用,常常与“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瓦哈比主义”等概念互换,由此引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国内学界所指代的萨拉菲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这又集中为两个涉及萨拉菲主义概念的问题:一是萨拉菲主义缘起的差异化;二是萨拉菲主义形态的模糊性。

(一) 萨拉菲主义“历史说”的差异

国内学者对萨拉菲主义的研究在其缘起方面有着较为一致的认同——“历史说”,即萨拉菲主义的产生并非 20 世纪以来的“新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不过,对奠基者的判断不同。

^① 王涛、宁彧:《英文文献中的萨拉菲主义研究述评》,《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 年第 3 期。

首先，伊本·罕百勒（Ibn Hanbal）起源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倡导经训、回归正统的思想源于伊本·罕百勒及其罕百里教法学派，^① 是对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式微、伊斯兰世界面临军事压力的积极响应，是对伊斯兰教各派争论不休的回应，兼具历史的针对性与继承性。^② 不管是当代的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还是近代的伊本·瓦哈布（Ibn Abd al-Wahhab），他们的思想源头皆为伊本·罕百勒。^③ 不仅如此，这一思想经 13 世纪的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18 世纪的瓦哈比运动、20 世纪初埃及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发展影响至今，直接催化了极端主义的产生。^④ 可见，伊本·罕百勒是萨拉菲主义的“奠基人”。只不过，萨拉菲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不同时空下互有差异，并非同质性的宗教思潮或运动。^⑤ 刘中民等也持类似观点，不过他们将这一历史延伸至更早的“哈瓦利吉派”（al-Khawarij）。^⑥ 这也意味着，萨拉菲主义强调经训、摒弃“效仿”的思想事实上早已有之。^⑦

其次，伊本·泰米叶起源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13 世纪阿拔斯王朝的灭亡构成了萨拉菲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而伊本·泰米叶便是这一思潮的鼻祖，可以说，伊斯兰教这种回归原初的思潮始于 13 世纪阿拔斯王朝的灭亡与哈里发制度的衰落；而 18 世纪出现在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19 世纪印度的阿里迦运动、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利比亚的赛努西运动等都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⑧ 包澄章同样认为，萨拉菲主义源于以伊本·

① 蔡佳禾：《试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第 52～53 页。

② 怒马：《赛莱菲耶思想初探》，《中国穆斯林》1995 年第 5 期，第 13 页。

③ 杨灏城：《从哈桑·班纳的思想和实践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世界历史》1997 年第 6 期，第 4～5 页。

④ 蔡伟良：《赛莱菲耶思潮探微》，《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63～65 页。

⑤ 吴云贵：《回望伊斯兰历史长河中的“赛莱菲耶”》，《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7 页。

⑥ 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西亚非洲》2016 年第 3 期，第 43～44 页。

⑦ 李维建：《当代伊斯兰教赛莱菲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世界宗教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66 页。

⑧ 向祖文：《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第 12 期，第 24 页。

泰米叶为代表的教法学家掀起的一场尊经崇古的运动。^① 如此, 诸如伊斯兰主义等概念亦能整合其中。其中, 刘义认为, 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内部不断重复的宗教复兴运动, 其最早可追溯至 13 世纪伊本·泰米叶及其所开创的萨拉菲主义。^②

最后, 伊本·阿布杜·瓦哈比 (Ibn Abdul Wahhab) 起源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 瓦哈比主义等具有与萨拉菲主义相似的概念内涵。18 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是伊斯兰世界向往复兴、恢复传统的萌芽阶段, 在历经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卜 (Sayyid Qutb)、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等学者的多元化阐释后发展至今。^③ 吴云贵认为, 作为一种宗教社会思潮,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最早兴起于 18 世纪, 瓦哈比主义便是这一思潮的早期形态。^④ 但是, 为了不把瓦哈比主义混同于政治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 便以“赛莱菲耶” 一词指代瓦哈比主义。赛莱菲耶与瓦哈比主义都成为某一伊斯兰教派。^⑤

此外, 部分国内学者的“历史说” 还存在这样一种认识, 即萨拉菲主义虽起源于历史, 但在近现代经历了新的发展演变, 由此发展出类似于“进化说” 的观点。例如, 王建平认为, 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 的源头则是基于哈桑·班纳的穆斯林兄弟会与阿布·毛杜迪 (Abu Maududi) 的伊斯兰促进会的思想和组织形式。^⑥ 东方晓认为, 伊斯兰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东地区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所经历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产物。^⑦ 而杨恕等则倾向于将萨拉菲主义的源头视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埃及阿富汗尼领导

① 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108 ~ 109 页。

② 刘义:《“伊斯兰主义”:全球处境、社会运动及其意识形态》,《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22 页。

③ 赵国忠、刘靖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在中东的政治前途》,《西亚非洲》1992 年第 2 期,第 22 页;熊家学:《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历史沿革与现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第 11 ~ 13 页。

④ 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14 页。

⑤ 希文:《“回归传统”的瓦哈比主义》,《世界宗教文化》2003 年第 3 期,第 38 页。

⑥ 王建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全球化》,《阿拉伯世界》2002 年第 2 期,第 3 页。

⑦ 东方晓:《伊斯兰主义向何处去?》(上),《西亚非洲》2007 年第 6 期,第 10 页。

的“萨拉菲主义运动”。^①

起源说的差异，是基于对萨拉菲主义所面对的外部压力，以及内部动力之间不同的互动过程的分析。因此，对不同时期的萨拉菲主义思想，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研判，不可一概而论。^② 萨拉菲主义虽然有着历史的传承过程，但随着其内部的分化，思想的功能性逐步退化，它所呈现的外在形式逐步蜕变为组织性存在。例如，广泛活跃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地区从事恐怖暴力活动的“圣战”组织便是由20世纪70年代传入当地的萨拉菲主义（瓦哈比主义）蜕变而来，并随之组织化、暴力化发展。

（二）萨拉菲主义形态的双重认知

萨拉菲主义不仅具有一定的观念普世性，而且具有相当的历史传承性。但是，随着近年来兴起的萨拉菲主义政党，以及打着萨拉菲主义旗号的“圣战”组织，学界对萨拉菲主义的形态认识出现了争议。

一方面，在观念形态下，国内学者就萨拉菲主义与诸如“极端主义”“瓦哈比主义”等关系进行了梳理，大致形成了“同义说”“差异说”。

“同义说”认为，萨拉菲主义是一种滥觞于9世纪的伊斯兰宗教思潮，其内涵与外延同“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瓦哈比主义”，乃至“极端主义”等概念相近或相似。^③ 王凤认为，“伊斯兰主义”概念指坚持伊斯兰发展道路的政党、组织及其成员，是对“政治伊斯兰”等称谓的取代。^④ 李维建认为，诸多伊斯兰概念是从不同视角囊括伊斯兰教中的思潮与现象的，内容并非截然不同。诸如萨拉菲主义与瓦哈比主义所阐释的某些主张，便与伊斯兰主义等概念有所重合。甚至，萨拉菲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中东地区的极端组织，南亚等地的“圣训派”运动等从本质上看与萨拉菲主义有关。此外，其与政治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也有密切联

① 杨恕、郭旭岗：《圣战派萨拉菲的缘起与现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85页。

② 吴云贵：《回望伊斯兰历史长河中的“赛莱非耶”》，《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期，第5页。

③ 吴云贵：《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论析》，《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第4~8页。

④ 王凤：《中东剧变与伊斯兰主义发展趋势初探——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4期，第35页。

系,区别仅在于实践的路径不同。^①

“差异说”认为,萨拉菲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关系较为复杂。在整体理念层面,杨恕等认为,不应将萨拉菲主义与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等同,故需区别对待。^②另外,在不同思想的互动方面,孙晓雯认为,瓦哈比主义存在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与各种伊斯兰思潮交织、互动的过程,其中,以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ashid Rida)为代表的萨拉菲主义者对瓦哈比主义提供了正面的形象。^③

另一方面,在组织形态下,这种模糊性认知主要集中于萨拉菲主义与赛莱菲耶、瓦哈比主义的关系,且差异较为明显。

已有学者指出,萨拉菲与赛莱菲耶同义,^④但在不同的研究中,萨拉菲与赛莱菲耶也明显不同。在《伊斯兰教辞典》中,赛莱菲耶是指诞生于埃及的,由穆罕默德·阿布杜等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西方称其为伊斯兰现代主义派。^⑤而在国内,赛莱菲耶则有着特定指代,即由伊赫瓦尼(Ikhwan)追随者马得宝(尕白庄)等人在麦加接受瓦哈比主义思想影响后回国建立的教派。^⑥对此,王涛等认为,差异是不同学科翻译词源的不同所导致的,而基于国内实际情况来看,赛莱菲耶专指某一组织,萨拉菲包含赛莱菲耶。^⑦

萨拉菲主义与瓦哈比主义的关系亦有混同,二者关系存在三说,即同一概念的不同称谓、萨拉菲主义对瓦哈比主义的包含,以及萨拉菲主义是

- ① 李维建:《撒哈拉以南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3期,第47~48页;李维建:《当代伊斯兰教赛莱菲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0~161页。
- ② 杨恕、郭旭岗:《圣战派萨拉菲的缘起与现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84~85页。
- ③ 孙晓雯:《瓦哈比主义与当代主要伊斯兰思潮关系探析》,《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2期,第120页。
- ④ 蒋海蛟、曹伟:《中亚圣战派萨拉菲:概念、过程、网络》,《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75页;杨恕、蒋海蛟:《“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5期,第39页。
- ⑤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第244页。
- ⑥ 马强:《瓦哈比运动与中国的伊赫瓦尼和赛莱菲耶——兼议国外伊斯兰思潮对中国教派形成的影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54页。
- ⑦ 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俄罗斯中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第98页。

瓦哈比主义的前身等。^①事实上，从观念形态看，两者的确共享相似的内涵与代表人物，李维建便将瓦哈比、赛莱菲耶（萨拉菲）共同置于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背景之下研究其思想的继承性，并认为，瓦哈比主义依然是萨拉菲主义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②但从组织形态看，萨拉菲主义与瓦哈比主义在学者的研究视阈中并不相同。萨拉菲派是由阿富汗尼于19世纪末所创立，致力于发展伊斯兰世界的“第三条道路”，^③有伊斯兰现代派之称。而瓦哈比派则有两种学说：一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意识形态。^④二是活跃于亚欧腹地的，自称“瓦哈比派”的一系列恐怖组织。^⑤

2011年后，萨拉菲主义政党着实影响着西亚、北非的政治生态，而当“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同样宣称信奉萨拉菲主义时，学界面临着对萨拉菲主义本体的认知困境。此时，国内学者在面对不同的国外研究经验，使用不同的语言工具时，差异由此产生。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避免了“标签化”解读，更注重追求历史的真实性。

二 机制：从“内生”到“外溢”的持续发展

萨拉菲主义在历史长河中持续演进，并在近些年来迅速发展，呈现从“内生”到“外溢”的过程。萨拉菲主义兼具观念形态与组织形态，致使这种过程由于载体与实践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
- ① 参见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第8页；杨恕、郭旭岗《圣战派萨拉菲的缘起与现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85页；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43~45页。
- ② 李维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瓦哈比派和赛莱菲耶派的早期理论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30~136页；李维建：《从“效忠与拒绝”理论探析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西亚非洲》2018年第3期，第24页。
- ③ 马和斌：《穆罕默德·阿卜杜胡的宗教改革思想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4期，第102页。
- ④ 钱学文：《沙特的瓦哈比主义》，《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3期，第36~38页。
- ⑤ 金宜久：《“瓦哈比派”辨》，载金宜久《伊斯兰与国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34~245页。

(一) 萨拉菲主义的“内生”

萨拉菲主义具有强烈的“认主独一”(tawhid)理念,对异教徒“零容忍”的“塔克非”(takfir,定叛)理念及秉承“圣战”的理念。^①由此,萨拉菲主义在“内生”性发展的基础上具备了一定宗教号召力与社会动员力。

第一,萨拉菲主义对早期宗教学者思想的继承。其一,伊本·罕百勒奠定了萨拉菲主义思想的内核。马景、李维建等认为,伊本·罕百勒确立了《古兰经》、圣训至高无上的地位及社会功用,严格规范了对“经、训”的遵守方式——回归《古兰经》与真主,且只能严格遵守,不做任何解释。^②这是萨拉菲主义思想的关键内核。其二,伊本·泰米叶突出了萨拉菲主义的政治理念。敏敬认为,在伊本·泰米叶的思想体系中,“创制”(ijtihād,伊智提哈德)至关重要,并形成以权力相对性、权力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支持政治实用主义、政治管理意识为代表的政治思想。^③其三,伊本·瓦哈比实现了萨拉菲主义从“思想”到“运动”的重大转变。钱学文认为,伊本·瓦哈比的思想是循古而非复古,其目标是统一半岛地区既已出现的伊斯兰信仰异化,统一一神信仰,消灭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造成的愚昧与无知。^④其四,早期萨拉菲主义者的思想时代性强于继承性。李维建认为,早期萨拉菲主义领袖思想的特征是时代性大于继承性。罕百里传统主义是仅有的共性,但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是各自特有社会条件下的产物,继承性居于次要地位。^⑤

第二,萨拉菲主义在近现代的拓展。其一,塑造了萨拉菲主义的“肌体”。潘志平、蔡伟良等认为,在“民族国家”话语权时代,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以

① 有关萨拉菲主义宗教理念的研究有基本共识:一是回归前三代的原则;二是严守《古兰经》、圣训的方式;三是对“异教徒”的身份标签。参见怒马《赛莱菲耶思想初探》,《中国穆斯林》1995年第5期,第14~15页;杨桂萍《当代赛莱菲耶及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回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76页;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0页。

② 马景:《伊本·罕百里的思想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10年第11期,第61~64页;李维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瓦哈比派和赛莱菲耶派的早期理论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32页。

③ 敏敬:《伊本·泰米叶的时代及其思想》,《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第118~121页。

④ 钱学文:《沙特的瓦哈比主义》,《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3期,第37~38页。

⑤ 李维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瓦哈比派和赛莱菲耶派的早期理论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30页。

“泛伊斯兰”为基础，致力于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族群、超地区、超宗教的政治共同体——“乌玛”（Umma）。^① 刘中民认为，在政治认同方面，各个时期的伊斯兰主义国家理论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对超越种族、民族、地域的“乌玛”的认同。^② 其二，建构了萨拉菲主义的“整体世界观”。在“整体世界观”下，萨拉菲主义与其他伊斯兰思潮，尤其是伊斯兰主义享有相近的内涵，被赋予了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宗教化的宏观认识。^③ 钱雪梅认为，伊斯兰主义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的政治思潮，在回归伊斯兰世界的前提下，是伊斯兰世界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外来思想实践均宣告“失败”情况下的反映。^④ 这也意味着伊斯兰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其全球性。^⑤ 其三，论证了萨拉菲主义的斗争方式。在中东，哈桑·班纳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旗手，极为重视“圣战”的作用，^⑥ 甚至哈桑·班纳直接否定了“大吉哈德”高于“小吉哈德”的传统观念，而赛义德·库特卜则从认识、手段、主体、目标四方面全面阐释了萨拉菲主义的斗争方式。^⑦ 在南亚，阿布·阿拉·毛杜迪虽然强调“圣战”的自卫性，但其消灭一切非伊斯兰统治的目标，使其“圣战”观带有鲜明的进攻性内涵。^⑧

第三，萨拉菲主义在当代的蜕变。库因坦·维克托罗维茨（Quintan Wiktorowicz）的“三分法”^⑨ 已是当前萨拉菲主义“条块化”研究的主流范式，^⑩

-
- ① 潘志平：《泛伊斯兰主义简论》，《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蔡伟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理性主义赛莱菲耶思想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5期。
- ② 刘中民：《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国家”思想》，《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第11~18页。
- ③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37页。
- ④ 钱雪梅：《现代伊斯兰主义同民族主义的关系》，《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第19页。
- ⑤ 刘义：《“伊斯兰主义”：全球处境、社会运动及其意识形态》，《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1期，第22页。
- ⑥ 陈天社：《论哈桑·班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渊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01页。
- ⑦ 胡雨、欧东明：《论哈桑·班纳的政治伊斯兰思想》，《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1期，第58~59页；胡雨：《赛义德·库特卜极端主义思想探微》，《西亚非洲》2010年第7期，第50页。
- ⑧ 王旭：《毛杜迪的圣战观念和伊斯兰革命理论》，《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8页。
- ⑨ 以实现信仰的道路孟哈吉（manhaj）为标准。参见 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17–228.
- ⑩ 西方学者佐尔坦·帕尔（Zoltan Pall）从拒绝与效忠政府、自身行动策略的不同提出了“四分法”，即“纯洁—拒绝主义者”“具有政治倾向的纯洁主义者”“政治主义者”“圣战主义者”，参见 Zoltan Pall, *Lebanese Salafis between the Gulf and Europe: Development, Fraction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of Salafism in Lebano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6–28. 转引自孙晓雯《政治萨拉菲主义：思想、演进与困境》，《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5期，第154页。

但在其“三分”下,萨拉菲主义的身份指代却出现了明显的重叠甚至冲突,^①国内学者对此认识的分歧较大。其一,“三分法”的继承与发展。包澄章、李维建等认为,根据行为方式差异,萨拉菲主义的内部流派亦可三分为传统(寂静)、“圣战”与政治萨拉菲主义。^②但是,这种标准存在不同的认识维度。基于对政治的亲疏,萨拉菲主义出现了“教团”与“政团”的分裂;基于“妥协”与“冲突”的强弱,又分化出议会斗争与武装冲突的路径,进而发展出暴力圣战模式。因此,如果坚持对萨拉菲主义的“三分”,其标准在于身份的认定,即教团型、政党型、反政府武装型。^③其二,对“三分法”的破立。有学者基于拒绝与崇尚暴力与否,将萨拉菲主义“两分”为“寂静派”与“圣战派”。^④但即使是暴力,圣战萨拉菲主义仍有“文斗”与“武斗”的差异,在约旦就出现了以阿布·马克迪西(Muhammad al-Maqdisi)为代表的温和派与以扎卡维为代表的激进派。^⑤而无论“文斗”与“武斗”,其目标是建立沙里亚法治下的伊斯兰国家,并以“效忠与拒绝”“劝善戒恶”理论作为支撑。^⑥而对于其中的政治萨拉菲主义而言,还存在着“异见型”与“政党型”的区别。^⑦在目标选取上,萨拉菲主义内部存在的“远敌”与“近敌”的论争,又反映出各极端组织的战略分歧。^⑧

① Joas Wagemakers, “A Purist Jihadi-Salafi: The Ideology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2, 2009; Simon Cottee, “Mind Slaughter: The Neutralizations of Jihadi Salaf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3, No. 4, 2010.

② 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11页;李维建:《从“效忠与拒绝”理论探析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西亚非洲》2018年第3期,第24页。

③ 宁彧、王涛:《萨拉菲主义“进化”的历史及当代表现》,《科学与无神论》2017年第5期,第40页;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6页。

④ 崔守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4期,第20页。

⑤ 李茜、黄民兴:《约旦圣战萨拉菲主义基本思想与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第173页。

⑥ 李维建:《从“效忠与拒绝”理论探析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西亚非洲》2018年第3期,第24页。

⑦ 孙晓雯:《政治萨拉菲主义:思想、演进与困境》,《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5期,第155~156页。

⑧ 王晋:《“远敌”与“近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部论争》,《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第139~156页。

（二）萨拉菲主义的“外溢”

萨拉菲主义的理念与实践影响几乎覆盖全部伊斯兰国家，并向其他国家渗透，已具有网络化乃至体系性特征，“外溢性”是萨拉菲主义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第一，沙特与瓦哈比主义者的推动，以及极端组织的“溢出”效应为萨拉菲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动力。其一，沙特与瓦哈比主义者的推动。总体来看，沙特的援助、教育、慈善推动着萨拉菲主义在亚非地区的传播，加速填补当地意识形态与基层组织机构的空白。^① 范若兰认为，东南亚的殖民地身份使当地社会精英急于寻求新的思想武器，于是萨拉菲主义先后通过麦加朝觐、留学等方式传入当地，从而引发当地回归伊斯兰、纯正信仰的运动。^② 辉明认为，借助沙特政府，萨拉菲主义不仅是统治者摆脱社会边缘地位，而且是强化社会认同的精神工具。^③ 蒋海蛟等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亚地区的哈乃斐学派穆斯林正是受到国内政治压制后，才进而接受了“萨拉菲-瓦哈比”思想的影响。^④ 李维建、李文刚等认为，非洲由于“文化断层线”的存在，当地穆斯林为抗击西方化、基督教化而找寻新的力量之源，瓦哈比主义便在此时到来。而且，非洲当地对援助有较强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快了萨拉菲主义的传播进度。^⑤ 虽然萨拉菲主义在非洲的传播类型多样、渠道多元，但主导权仍由沙特与瓦哈比主义者所掌控。^⑥ 当然，这里要将瓦哈比主义与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区分开。其二，极端组织的“溢出”效应。一是共同身份的纽带作用。吴云贵等认为，阿富汗则是

-
- ① 涂怡超：《宗教与沙特外交：战略、机制与行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第46页。
- ② 范若兰：《近代以来中东地区伊斯兰思潮在东南亚的传播方式和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第85~88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第73~77页。
- ③ 辉明：《萨拉菲主义在印尼的传播和发展》，《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2期，第30~31页。
- ④ 蒋海蛟、曹伟：《中亚圣战派萨拉菲：概念、过程、网络》，《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78页。
- ⑤ 李维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3期，第52页；李文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主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2期，第85~86页。
- ⑥ 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极端化及其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4期，第49~51页。

萨拉菲主义实践的“战场”，活跃在“动荡弧”地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极为重视曾在阿富汗的作战经历，甚至共享“阿富汗人”的身份标签。^①二是网络化、体系化的蔓延。张家栋、钱雪梅等指出，“9·11”后的“基地”组织已成为一个由组织核心、附属组织、合作组织和非附属恐怖主义小组与个人构成的多层次、较松散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呈现“标签化”或意识形态特征。而在当前，“基地”组织已具有了内核、中坚力量、外围的体系性特征，且内核相对沉静、分支与外围活跃。^②三是竞争性扩散。杨凯认为，“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在南亚、东南亚的主导权争夺所引发的溢出效应，推动了极端思想在当地的蔓延。^③周明等认为，无论是吸引外籍人士，抑或激励“独狼”式袭击，“伊斯兰国”的社会动员能力要强于“基地”组织，二者关系走向直接影响到极端组织的发展。^④其中，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区域性极端组织发展的碎片化。在“伊斯兰国”鼎盛阶段时，曾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青年党”（al-Shabaab）、“博科圣地”（Boko Haram）便由于部分组织“高层”向“伊斯兰国”效忠而出现内讧、分裂，导致非洲之角、萨赫勒西部地区恐怖主义组织发展碎片化，^⑤这便是萨拉菲主义竞争性扩散的直接影响。

第二，萨拉菲主义积极拉拢、整合广大非伊斯兰国家中广泛存在的穆斯林社区，为萨拉菲主义的全球扩散提供了可能。其一，穆斯林移民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李维建认为，欧洲历史上两次穆斯林移民都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并造成严重的欧洲移民症，冲突中为萨拉菲主义的渗透提供了契机，

-
- ① 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第5页；王晋：《“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组织演变与行为模式》，《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第54页；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83页。
- ② 张家栋、朱道运：《基地组织现状与发展趋势》，《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第40~43页；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1~123页。
- ③ 杨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东南亚、南亚的扩张比较》，《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第110~111页。
- ④ 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110~111页。
- ⑤ 宁彧：《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世界民族》2017年第3期，第43~44页；宁彧：《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8，第94~95页。

形成了“伊斯兰威胁欧洲”的论调。^①汪波认为，欧洲宗教极端意识形态通过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激进但非暴力的政治势力、欧洲穆斯林社群中“合法化”的伊斯兰组织的“金字塔”结构得以渗透，从而为极端主义组织提供人员与资金的支持。^②其二，“内生”与“外源”的共生。杨桂萍认为，朝觐与留学归国依然是我国国内萨拉菲派（三拾、白派）得以传承发展的主要“外源性”路径。此外，国内穆斯林通过《古兰经》、“圣训”的研习明确回归传统的重要，并转向萨拉菲，则视为“内生性”路径。^③其三，武装暴力冲突的整合。一是反政府武装形态。王逸舟认为，俄罗斯北高加索的车臣等地区的宗教民族主义问题突出，多次兵戎相见，已成为“世界上最猖獗的恐怖主义策源地之一”。^④潘光等认为，活跃于我国境内的“东突”组织与中亚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有密切关系，影响十分恶劣。^⑤二是人员回流与“独狼”（Lone-wolf）形态。严帅认为，随着“基地”行动策略调整，“独狼”式恐袭已成为威胁欧美安全的主要方式，互联网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⑥

由此可见，根植于沙特阿拉伯与阿富汗，活跃于伊斯兰世界的萨拉菲组织，以及广泛分布的穆斯林自治区与社区的萨拉菲主义者共同构成了权力层次分明、影响辐射全球的“金字塔结构”宗教政治体系，并具有“中心—边缘”双向互动的特征。

三 议题：向恐怖主义与区域安全研究集中

国内学界对萨拉菲主义的“安全化”转向与国际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关注重点集中于恐怖主义与区域安全。其中，针对恐怖主义着重探讨了圣

-
- ① 李维建：《“伊斯兰威胁欧洲”——政治的想象与宗教的建构》，《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78~80页。
- ② 汪波：《欧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性质和内在结构研究》，《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第101~114页。
- ③ 杨桂萍：《当代赛莱菲耶及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回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78页。
- ④ 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02页。
- ⑤ 潘光：《欧亚大陆腹地极端与恐怖主义组织发展态势及对中国的威胁》，《国际展望》2013年第5期，第94~96页；杨恕、蒋海蛟：《“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5期，第46页；赵国军：《“东突”恐怖活动常态化及其治理》，《国际展望》2015年第1期，第107~110页。
- ⑥ 严帅：《“独狼”恐怖主义现象及其治理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5期，第50~51页。

战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功能；针对区域安全则主要强调萨拉菲主义组织引发的危机，以及危机“外溢”在敏感地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一) 萨拉菲主义的恐怖主义异变

圣战萨拉菲主义是当前众多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的核心意识形态，围绕其意识形态的产生、实践、追随，国内学者形成了多方面的认识。

第一，圣战萨拉菲主义与极端组织的核心意识形态。以历史的眼光研判圣战萨拉菲主义是国内学者的特色所在。其一，圣战萨拉菲主义产生的因素。吴云贵曾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联系作用，战乱、地缘政治、世界政治的刺激因素，宗教极端主义对“圣战”的曲解效应共同造就了圣战萨拉菲主义。^① 杨恕、郭旭岗指出，萨拉菲主义与“圣战”并无内在联系，但经历苏联入侵阿富汗、海湾战争、国内外的客观环境的刺激后两者逐渐融合。^② 崔守军认为，圣战萨拉菲主义是极端主义与国际政治互动进程中的产物，扎瓦赫里将“定叛”视为伊斯兰运动的核心，“圣战”是践行“定叛”的手段。^③ 周明、雷环瑞认为，对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他萨拉菲派别思想的融合、为“真理”献身的自我认同、支撑“圣战”运动的松散独立学者网络等促使圣战萨拉菲主义产生。^④ 其二，极端化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李茜、黄民兴认为，圣战萨拉菲主义基本思想主要包含真主主权原则，忠于与不忠原则，圣战思想，反对当代“蒙昧”政权，否认偶像崇拜与多神教、异教徒。^⑤ 王涛等认为，萨拉菲主义虽有派别之分，却共享核心理念，即“认主独一”“定叛”“圣战”，暴力的异化取决于信徒的片面诠释与应用。^⑥

-
- ① 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第2~6页。
 - ② 杨恕、郭旭岗：《圣战派萨拉菲的缘起与现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85~87页。
 - ③ 崔守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4期，第29~30页。
 - ④ 周明、雷环瑞：《“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伊斯兰国化”》，《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第57页。
 - ⑤ 李茜、黄民兴：《约旦圣战萨拉菲主义基本思想与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第173页。
 - ⑥ 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0~101页。

李维建进一步指出，“劝善戒恶”为极端主义者不计后果地公开指责、批评政府，督促政府履行劝善戒恶提供了解释力；“效忠与拒绝”则为极端主义者以暴力驱逐异教徒、净化伊斯兰提供了行动力。^① 李维建认为，“效忠与拒绝”已从最初的部落传统发展为伊斯兰教的宗教-政治概念。根据其义，憎恶、仇恨、战争是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的必然选择。^② 丁隆等认为，“忠诚与抗拒”^③ 不仅是萨拉菲主义的支柱意识形态，而且也是实践“认主独一”的核心信条。而被萨拉菲主义政治化诠释的“忠诚与抗拒”原则还逐渐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④

第二，“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萨拉菲主义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正如钱雪梅所指，鉴于萨拉菲主义体系的庞杂，“基地”组织所强调的仅是萨拉菲主义与暴力“圣战”的关联，并以“坚持圣战并最终战胜异教徒”为萨拉菲主义的核心美德来重塑萨拉菲。^⑤ 同样，李捷、周明等表示，“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中最明显的标签仍是圣战萨拉菲主义。以此为标准，“伊斯兰国”并未突破已有理解。^⑥ 不过，在“全球圣战”的领导权、阐释权问题上，两者却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状态，并以“全球恐怖主义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权”模式作为两大恐怖集团意识形态的竞争性扩展的具体方式。^⑦ 其一，“远敌”与“近敌”的选取，即“基地”组织优先攻击“远敌”，而“伊斯兰国”优先攻击“近敌”。刘中民等表示，提倡“泛伊斯兰”团结，避免教派矛盾是“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显著差异，其核心在于如何

① 李维建：《当代伊斯兰教赛莱菲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5页。

② 李维建：《从“效忠与拒绝”理论探析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西亚非洲》2018年第3期，第23页。

③ “效忠与拒绝”与“忠诚与抗拒”同义，均翻译自“Al-Wala' wal-Bara”，差异是翻译的不同表达。

④ 丁隆、妥福良：《萨拉菲主义对“忠诚与抗拒”原则的政治化诠释》，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1期，第51~60页。

⑤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8~129页。

⑥ 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12期，第8页；周明、雷环瑞：《“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伊斯兰国化”》，《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第66页。

⑦ 王涛、鲍家政：《恐怖主义动荡弧：基于体系视角的解读》，《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123页；沈晓晨：《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第108页。

对待“近敌”什叶派。^①周明、曾向红认为,与本·拉登相比,扎瓦赫里对攻击“近敌”却念念不忘。^②崔守军指出,本·拉登直至 1998 年才将攻击目标从占领伊斯兰领土的“近敌”转向美国这一“远敌”。^③对于目标的转换,王晋指出,攻击“远敌”事实上反映出的是,极端主义者无法就地动员更多资源的一种无奈策略。^④其二,建国目标的诉求,即“基地”组织将建国寄希望于长期斗争,而“伊斯兰国”则力求速战速决。^⑤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二者的组织结构上。钱雪梅分析,当前的“基地”组织呈现的是内核、中坚、外围构成的三层同心圆结构。^⑥王晋认为,管理核心的部门分工与地方机构的存在,使“伊斯兰国”已具有了准国家的雏形。^⑦而宛程认为,本·拉登的去中心化运动,不宣布建国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以避免来自西方的打击。^⑧

第三,其他极端组织对萨拉菲主义的追随。中间地带的宗教极端组织虽笃信萨拉菲主义,但采取了本土化的追随策略。一是面临同样的“远敌”与“近敌”的困境,采取类似的行动。诸如“青年党”“博科圣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无一例外出现了此类情况,局势动荡中不仅造成组织资源的浪费,甚至引发内讧乃至分裂。^⑨潘光指出,在萨拉菲主

-
- ① 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52~54页。
- ② 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102页。
- ③ 崔守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4期,第29页。
- ④ 王晋:《“远敌”与“近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部论争》,《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第155~156页。
- ⑤ 参见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30页;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12期,第15页;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50~52页;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104~106页;等等。
- ⑥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1~123页。
- ⑦ 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147~149页。
- ⑧ 宛程:《“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第84页。
- ⑨ 参见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86~88页;宁彧、王涛《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世界民族》2017年第3期,第43页。

义的影响下，“国际圣战”或许是大趋势。例如，受萨拉菲主义影响下的“乌伊运”（IMU）、“东伊运”（ETIM）便致力于模仿“基地”组织话语与实践，进而将行动目标转向国际。^①二是激化与苏非主义的教派冲突。反苏非主义是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激起的主要教派冲突，对此，国内学者分析认为，“博科圣地”“青年党”等萨拉菲主义组织认定苏非主义中的偶像崇拜属多神论范畴，违背了伊斯兰教中的“认主独一”，并以袭击苏非道堂、拆除圣墓、诉诸暴力实践，为此还专门建立了“反偶像崇拜部”，由此引发与部分苏非派的矛盾。^②三是强化民族因素的超然地位。世俗化的民族因素或许不被“基地”组织、“伊斯兰国”重视，但在区域型宗教极端组织的宣传、招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青年党”具有核心认同与宣传作用的意识形态也是基于氏族主义与泛索马里主义，圣战萨拉菲主义仅是体现其宗教正统性的工具。而在谢考领导下的“博科圣地”也具有卡努里族认同的意识形态特征。^③

（二）萨拉菲主义与地缘政治影响

“地缘性”分析框架是国内学者在探讨萨拉菲主义与中东局势、非洲萨赫勒安全、中亚及我国周边安全所关注的重点。萨拉菲主义的政治化、极端化及其外溢是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一，萨拉菲主义与中东地区政治生态的改变。对此，国内学者主要探讨了中东地区萨拉菲主义政党势力的兴衰引发的政治，乃至地区博弈。王凤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为例指出，伊斯兰主义温和派自2011年以来，正谨慎、稳健地参与本国民主政治发展，推动自身向“非神权”“公民政党”转变，以求合法参政，进而成为本国重要的执政力量。^④但方金

① 潘光：《欧亚大陆腹地极端与恐怖主义组织发展态势及对中国的威胁》，《国际展望》2015年第5期，第90~92页。

② 李福泉：《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演进与特点》，《国际论坛》2012年第6期，第75页；李维建：《解读“博科圣地”：宗教研究的视角》，《西亚非洲》2015年第2期，第123页。

③ 李维建：《解读“博科圣地”：宗教研究的视角》，《西亚非洲》2015年第2期，第121页；宁彧、王涛：《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世界民族》2017年第3期，第33~36页。

④ 王凤：《中东剧变与伊斯兰主义发展趋势初探——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4期，第45页。

英表示,“萨拉菲派新月”与“什叶派新月”的分化成形,原本世俗主义的痼疾,以及穆斯林兄弟会温和派与萨拉菲激进派的博弈,使中东无论在地区层面,抑或在国别层面,都成为政治、宗教斗争的战场。^①包澄章认为,萨拉菲主义政党正以合法选举、议会斗争的形式参与中东国家政局。但是,萨拉菲主义在国内不断增强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不仅会影响到中东政治生态与政治版图,而且会使中东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进一步扩大。^②刘中民、李志强认为,伊斯兰主义政党虽然改变了部分中东国家的政治生态,但依然受制于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以及治理经验的不足等现实性因素。不仅如此,中东地区围绕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形成了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的反对派,以及以土耳其、卡塔尔为代表的支持派的分歧,进而映射出中东地区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约旦、叙利亚等国内伊斯兰主义政党影响外溢所引发的地区大国博弈。^③孙晓雯则认为,政治萨拉菲主义由于在国内的辅政角色、政治实用主义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挑战,以及难以在宗教原则和政治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因此在中东政治舞台上仅是昙花一现。^④

第二,萨拉菲主义与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带的形成与扩散具有显著的地缘性特征。其一,世俗性与宗教性地缘政治的催发。国内研究者指出,“青年党”“博科圣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兴起是受到结构化因素的影响,即内部社会的矛盾、外部治理的失衡、国际恐怖主义的渗透等,并以此梳理了部分代表性极端组织的发展脉络。^⑤而随

① 方金英:《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3期,第15页。

② 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16页;包澄章:《当代科威特萨拉菲主义组织、流派及其地缘影响》,《宗教与美国社会》2014年第1期,第185~188页。

③ 刘中民、李志强:《中东变局与伊斯兰政党的新发展》,《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98~103页;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73页。

④ 孙晓雯:《政治萨拉菲主义:思想、演进与困境》,《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5期,第163~165页。

⑤ 相关研究请详见刘鸿武、杨广生《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探析》,《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56~58页;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85~88页;李维建《解读“博科圣地”:宗教研究的视角》,《西亚非洲》2015年第2期,第119~121页;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81~85页;李文刚《“博科圣地”的演变与尼日利亚反恐政策评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4期,第65~66页。

着研究的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宗教极端组织的本土化因素与“全球圣战”理念的矛盾越发突出，意识形态的分歧直接引发组织分裂，致使安全问题碎片化。^①其二，极端组织的跨境活动与地缘安全。李文刚认为，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介入图阿雷格人（Tuareg）问题后，加剧了图阿雷格人内部的矛盾分化，马里北部局势进一步恶化。^②王涛等认为，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是理解“青年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活动的关键要素，恐怖主义非国家行为体已逐渐成为影响当地安全局势的主要变量。^③刘青建、方锦程则指出，“青年党”“博科圣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存在，使世界“动荡弧”从南亚、中亚、中东延伸至非洲，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了更大的生存与活动空间。^④其三，竞合关系与极端组织的外部呼应。王晋认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萨赫勒分支曾经领导、协调的伊斯兰武装团体多达30个，且与“伊斯兰国”的关系十分微妙。^⑤刘中民等认为，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颓势尽显，其逐步在萨赫勒地区寻求合作，争夺原“基地”组织势力范围，会加剧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碎片化。^⑥基于此，王涛等分析认为，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间并非持续友好，而是存在竞争性、合作性、联盟性的互动关系；人员、资金的流动，观念的互通、共识的培育则是互动的表现。^⑦

第三，萨拉菲主义与我国对外安全风险增大。苏畅认为，萨拉菲主义的煽动性、各极端组织的跨区域活动使其极易在中亚发展“合作伙伴”。

-
- ① 王晋：《“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组织演变与行为模式》，《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第53~57页；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86~91页；宁彧、王涛：《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世界民族》2017年第3期，第43~44页。
- ② 李文刚：《马里的伊斯兰教与民主化》，《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3期，第60~62页。
- ③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85~88页；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94~97页。
- ④ 刘青建、方锦程：《非洲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扩散问题探析》，《现代国家关系》2014年第11期，第23页。
- ⑤ 王晋：《“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组织演变与行为模式》，《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第61页。
- ⑥ 刘中民、赵跃晨：《“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国际展望》2018年第2期，第119页。
- ⑦ 王涛、鲍家政：《恐怖主义动荡弧：基于体系视角的解读》，《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122~128页。

不仅如此,由萨拉菲主义所激起的冲突对中亚有着极强的魅惑力。^①杨恕、蒋海蛟等认为,2011 年以来,由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扩散与“圣战”组织的分化,加之中亚良好的教众基础,以“哈里发战士”(Jund al-Khilafah)、“虔诚首领之军”(Zhaishul-Makhdi)为代表的圣战萨拉菲组织在中亚异常活跃,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深受其害。并且,由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对我国新疆地区构成严重威胁。^②潘光认为,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的人员和武器可能通过中国与中亚、南亚的边界进入中国新疆,并对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妇女、青年群体,以及我国穆斯林海外留学生宣介。^③不过,“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在中亚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使其在当地的号召力远不如中东,但其营造的“激进环境”、战斗人员回流与“独狼式”的袭击、边界袭扰与有组织的犯罪等活动仍对当地正常秩序构成威胁。^④

结 语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围绕概念辨析、演变机制、恐怖主义与区域安全等问题,对萨拉菲主义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不仅对萨拉菲主义宗教文化内涵进行了有益拓展与延伸,而且并未忽视萨拉菲主义的政治安全议题。国内学界对萨拉菲主义持历史的、开放性的态度,避免了西方学界“标签化”“安全化”“条块化”的分析路径。不过,国内学界虽然就萨拉菲主义的历史起源论观点较为一致,但在演变机制、地缘影响等方面仍有部分争论,并且产生了国内语境下特有的阐释困境。具体而言:

第一,国内学界对萨拉菲主义历史的梳理,摆脱了西方学界萨拉菲主义

-
- ① 苏畅:《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特点及发展趋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第 57 页。
 - ② 杨恕、蒋海蛟:《“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5 期,第 42~46 页;蒋海蛟、曹伟:《中亚圣战派萨拉菲:概念、过程、网络》,《新疆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第 80~81 页;
 - ③ 潘光:《欧亚大陆腹地极端与恐怖主义组织发展态势及对中国的威胁》,《国际展望》2015 年第 5 期,第 95~96 页。
 - ④ 宛程、杨恕:《“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迷思还是现实?》,《国际安全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128~147 页。

研究“安全化”导向的思维束缚。“过度安全化”是西方萨拉菲主义研究的特点所在，即无论是西方研究中的本体论，抑或实践论，贯穿始终的核心议题是“政治安全”，这也意味着，极富宗教色彩的萨拉菲主义在西方语境下本质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安全问题，致使西方学界经常出现或将萨拉菲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的简单论断，或对萨拉菲主义组织进行恐怖组织“标签化”的判断。与之相比，国内学界对萨拉菲主义进行历史回望，从“哈瓦利吉”派的起源，经伊本·罕百勒、伊本·泰米叶、伊本·瓦哈比、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等宗教学者阐释发展，萨拉菲主义已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周期性自我调节，并共享核心意识形态理念，与暴力并无直接关联。其“圣战”“暴力”的叙事，仅是特定信徒与组织异化的结果。

第二，国内学界在避免萨拉菲主义“标签化”的同时，或许也面临“主义”的阐释困境。西方学界对萨拉菲主义的“安全化”判定，以及“标签化”“条块化”认知路径在研究中起到了“奥卡姆剃刀”式的效果，不过，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直接误导西方大众媒体报道并左右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话语。^①国内学界的研究虽避免了上述问题，但或许面临另一个特有的阐释困境，即“主义”的泛化。当前，国内涉及萨拉菲主义研究的“主义”包括但不限于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瓦哈比主义、赛莱菲耶等，这些研究议题的形成既可以理解为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对萨拉菲主义特定形态的不同认知，又可以视为不同经验研究、不同语言工具下的还原性成果。

[责任编辑：谢志斌]

① Robin Wright, “Don’t Fear All Islamists, Fear Salafi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8/20/opinion/dont-fear-all-islamists-fear-salafis.html>; Claude Moniquet, *The Involvement of Salafism/Wahhabism in the Support and Supply of Arms to Rebel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Brussels: European Union, 2013; Fabio Merone, “Between Social Contention and Takfirism: The Evolution of the Salafi-jihadi Movement in Tunisia,” *Mediterranean Politics*, September 2016.

Abstract

Concepts, Mechanisms and Issues: A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Salafism

Ning Yu, Wang Tao

Abstract: The salafism has been studied by domestic scholars in long term, including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field.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western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Domestic scholars who adhere to the “Generalized” analysis path so as to realize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Religion-Culture and the return of the topic of Politics-Security. “Historicality” or “Modernity”, “Organization” or “Conception”, and the debate of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Purists”, “Politicos” and “Jihadis” about Salafism is continuously present in western academic fiel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ity”, the domestic scholars explained the expansion and penetration of Salafism at the level of system and unit, and then distinguished the different evolution mechanism of Salafism with different existent forms. These series of studies appreci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lafism in specific era, meanwhile avoided the cognitive dilemma of “Categorization” and “Labelling” in western academic field. Not only that, as a result of the beneficial expan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Religion-Culture of Salafism, the domestic scholars formed different view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Security. Among them, the generation and function of Salafism ideology,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sensitive areas with Salafism are analyzed not only in the empirical study, but also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so as to avoide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xcessive Securitization” of salafism.

Keywords: Salafism; Ideology; Regional Security

The Plights and Choices of Sinai Peninsula Bedouin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Anti-Terrorism in Egypt

Zhang Jingwei

Abstract: The Bedouins are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n Sinai Peninsula. They have strong tribal belonging and identity, and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inai. After the return of Sinai Peninsula to Egypt in 1982, the Egyptian government's efforts in the Sinai were generally ineffective, resulting in difficulties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Bedouins. After Egypt's upheaval in 2011, Islamic extremist groups expanded and entrenched in Sinai, attracting some Bedouin support, and the counterterrorism situation in Sinai worsened. Under the severe anti-terrorism situation, Bedouins are faced with three dilemmas, namely, the survival dilemma caused by the improper policies of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position between Islamic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and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pursuing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es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into Egyptian society and their traditional tribal identity. Under the efforts of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the Bedouins finally chose to fight against the extremist forces together with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This choice is not only vital to the survival of the Bedouins, but also conducive to the ultimate victory of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ts. The peaceful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inai requires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to effectively and completely solve the survival plight of the Bedouins and win their long-term support.

Keywords: Sinai Peninsula; Bedouins; Extremist Groups; The Egyptian Government